

# 恩格斯晚年书信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启示

吴艳东,李洁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恩格斯在其晚年书信中揭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虚假性”内涵、阐明了意识形态的第二性和相对独立性、揭示了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增长点和创新点。恩格斯晚年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体现了批判与反思、论争与建构、创新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归纳概括恩格斯晚年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探究其内在逻辑,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社会思潮,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基本观点; 内在逻辑; 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2-0005-09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初步论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提出了一系列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主张。恩格斯晚年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和新变化。此时,无产阶级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工人阶级急需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应对无产阶级运动中存在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恩格斯结合时代背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集中体现在 19 世纪 90 年代所写的五封书信:《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 年 8 月)、《致约瑟夫·布洛赫》《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 年 10 月)、《致弗兰茨·梅林》《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对比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思想和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对于旗帜鲜明做好新时代意

---

**[收稿日期]** 2021—09—13

**[基金项目]** 本文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VSZ027)、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20YBMK009)、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新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战略价值和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SKSZ006)、西南大学 2018 年度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培育项目“新型智库嵌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及路径选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吴艳东(1976—),湖北荆州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李洁(1994—),女,河南安阳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

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 一、恩格斯晚年书信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晚年书信从揭示意识形态概念的“虚假性”内涵出发,层层深入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这些观点从产生过程、基本特征、内在结构、社会功能四个角度,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一)揭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虚假性”内涵

自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以来,其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意识形态一词最初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用来表示新的观念科学。由于马克思并未对意识形态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要想全面地诠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多元内涵,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sup>[1]</sup>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虚假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阐释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一个重要角度。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开篇所说,“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sup>[2]509</sup>结合文本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正是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颠倒了思维和现实的关系,才使得虚假观念得以产生,使得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带有一定的虚假性。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晚年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首次界定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并揭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虚假性”内涵。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sup>[3]642</sup>这一经典表述从以下三个方面表达了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首先,从其重要意义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使用意识形态术语的地方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对它作过具体的界定,这是唯一的一次。”<sup>[4]</sup>其次,这句话将意识形态指向虚假意识,指出虚假性是“思想家”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虚假意识,指的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说一切意识形态都是虚假意识。最后,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分析了“思想家”的意识形态成为虚假意识的形成原因。恩格斯指出,“思想家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并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sup>[3]642</sup>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下产生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就是说,由物质生产条件产生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虚假意识,也不可能成为虚假意识。“思想家”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会成为虚假意识,是因为他们把意识形态完全独立化,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使意识形态成为虚假意识。综上,恩格斯晚年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揭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虚假性”内涵,为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的第二性和相对独立性,阐释意识形态的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 (二)阐明了意识形态的第二性和相对独立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无限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并进一步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5]152</sup>这句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最初表述,指出了物质生产实践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第二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试图通过希腊史诗说明“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sup>[6]710</sup>揭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而指出艺术这一具体的意识形态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晚年在批判巴尔特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错误做法的基础上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并指出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在1890年8月《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这是第二性的作用。”<sup>[3]598</sup>也就是说,物质存在方式决定思想领域,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思想领域是在物质存在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反作用于物质存在方式,因此是第二性的。其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晚年书信中重点论述了这一问题,尤以1890年10月《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论述最为集中。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指出,“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sup>[3]609</sup>这是恩格斯第一次提出“相对独立性”这个概念。从总体上看,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形态的反映,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上是同步的。但有时,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能超前或落后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以哲学为例,“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sup>[3]612</sup>例如,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济上落后于英国,但在哲学方面却领先于英国。由此可见,恩格斯晚年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第二性、相对独立性,深化了他和马克思早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三)揭示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个由社会心理、知识与信念有机结合的总体性概念,是由各种具体意识形态形式按照一定的层次和顺序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按照各种具体意识形态形式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联系的紧密程度,对各种意识形态形式进行了划分。政治、法律、经济是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联系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形式。道德、艺术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联系比较间接,宗教和哲学是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最远的意识形态形式。

恩格斯晚年同样根据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和经济基础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对意识形态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意识形态的中间环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sup>[3]260</sup>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同步的,政治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距离最远,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是漂浮于空中的。所以当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产生联系时,这种联系是间接而混乱的。这是因为在二者产生联系的过程中,往往受到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间因素的影响,才会模糊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在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的内容形式不断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而经济基础如果想对哲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产生作用,则需要借助政治、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帮助。恩格斯在1890年10月《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两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sup>[3]613</su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影响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由于政治、法律、道德等因素对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影响最大,因此,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要通过政治、法律、道

德等“中介”才能对哲学、宗教产生影响。通过论述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四)强调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sup>[5]178</sup>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思想,具有维护政权的功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置于社会结构的系统中来理解,指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sup>[6]2</sup>指出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恩格斯晚年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指出意识形态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sup>[3]604</sup>首先,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信中,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sup>[3]649</sup>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社会意识的合力推动历史的发展,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是对诸多恶意歪曲和攻击唯物史观的错误思想的有力回击。其次,恩格斯论述了意识形态诸多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1890年,恩格斯在给德国大学生约瑟夫·布洛赫的回信中指出:“有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sup>[3]605</sup>这充分表明经济因素并不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唯一因素。社会意识诸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同样对社会历史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从事历史活动的个人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个人的意志不是以简单相加的形式就能推动历史发展。相反,这些个人的意志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合力论的基本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重要补充。

## 二、恩格斯晚年书信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

恩格斯晚年在批判巴尔特和“青年派”的论战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强烈否定,致力于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继承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聚焦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得以创新和发展。这一发展历程体现了批判与反思、论争与建构、创新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 (一)批判与反思:集中体现在对巴尔特和“青年派”的批判

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也贯穿于恩格斯晚年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始终。意识形态概念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到了马克思时期,已经带有浓厚的批判色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表现为元批判,通俗地说就是除去遮蔽物的意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编造出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以便遮蔽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方式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披上了“合法”和“真理”的面纱。

在恩格斯晚年所处的时代,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一度处于低潮的无产阶级运动又重新高涨起

来。此时,在工人运动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急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然而,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公然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和“青年派”思想家保尔·恩斯特。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恩格斯多次对二人的观点进行批判。首先,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写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批判了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谬论。恩格斯指出,“这些先生们常常是几乎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sup>[3]644</sup>其次,在反击巴尔特的同时,恩格斯也对“青年派”思想家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现成的公式,用它来裁剪一切历史事实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判。在当时的“青年派”思想家中,恩斯特是一个突出的代表。恩斯特于1890年8月9日在《柏林人民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危险》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斯特一方面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一种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认为,这一做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缺乏说服力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是在跟风车作斗争。另一方面,恩斯特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唯物主义当作标签贴到具体的事物上,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针对这种教条做法,恩格斯一再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sup>[3]595</sup>以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因而他们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就更大。为了批判这些错误观点、揭示其危害,恩格斯在其晚年书信中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构建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 (二)论证与建构: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并认为只有祛除资本主义社会对意识形态的遮蔽,改变现存不合理的世界,才能建构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此时,社会的运行不再服从于阶级的统治,“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sup>[2]553</sup>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维护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

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仍然是以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重点。恩格斯晚年,意识形态问题比较突出和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扩大,不断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其二,由于不理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使得无产阶级政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屡犯错误。因此,为了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恩格斯认为要以资本为切入点,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奥秘。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批判了洛贝尔图斯对资本的错误认识,指出洛贝尔图斯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是为了让事物必须符合概念。然而,只有在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寻求事物的实质,才能得到对资本的正确认识。洛贝尔图斯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中得出资本的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他们在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恩格斯认为,“这样一来,一切坏的属性,即一切真实的资本属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sup>[3]571</sup>也就是说,对于资本的理解要从事物和关系的共同内容中概括出一般表现,要用思维形式反映已存在事物中的内容。如果不能从目前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中得出资本的概念,就无法解开资本的真正面纱。由于社会关系是由社会生产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上层建筑要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不仅有助

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唯物史观,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客观事实,为后期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 (三)创新与发展:运用辩证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意识形态学说的形成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sup>[7]</sup>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为了阐述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原理,也为了同社会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作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述较多,而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反作用的论述较少。这就为恩格斯晚年运用辩证法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增长空间。

恩格斯晚年巧妙运用辩证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恩格斯晚年将辩证法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在其书信中阐释了经济基础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且聚焦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首先,恩格斯认为,不管是巴尔特也好,还是“青年派”也好,他们所犯的共同错误在于他们不理解辩证法。“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sup>[3]614</sup>巴尔特和恩斯特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懂得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观点,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导致自身陷入错误理论的泥沼中去。针对保尔·巴尔特等人对唯物史观的歪曲,恩格斯从辩证视角出发,以具体事实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进一步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恩格斯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在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时将辩证法融入其中,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以创新视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其次,恩格斯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意识形态独立性理论的核心。恩格斯晚年反复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sup>[3]614</sup>前文的论述表明,恩格斯晚年在其书信中重点说明的就是法、哲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形式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的能动反作用。这就表明,不能只看到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应该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唯物史观,也要看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个反作用可能会先于或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阶段成为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因素,但终归不能否定社会意识能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事实。由此可见,恩格斯晚年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捍卫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三、恩格斯晚年书信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通俗化和系统化的首要完成者。”<sup>[8]</sup>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诸多现实启示。只有将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融入到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社会思潮,才能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虚假性”内涵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所以其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路明灯。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推动部署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巩固深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sup>[9]</sup>,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关键在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无论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前车之鉴,还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形势,都要求我们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sup>[10]21</sup>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更是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准确辨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 (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晚年书信中运用辩证法强调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反作用的观点,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10]33-34</sup>这一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经济是党始终坚守的“中心工作”,以中心工作促进其他各项工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可以说,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已经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在世界话语体系中,我国依然处于劣势,对外传播仍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宣传思想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还是在中东、北非、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中,西方国家都利用新闻舆论战,干预他国内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一些政客热衷于对外“甩锅”、推卸责任,利用“口罩外交”“疫苗外交”攻击抹黑中国,贬低中国为全球抗疫做出的巨大贡献。此外,美国制造了一个“病毒来自中国研究室”的舆论攻击话题,嫁祸中国,使我国在舆论战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充分证明,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要重视并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 (三)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

恩格斯晚年提出,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在相互影响中形成强大合力,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观点,需要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sup>[10]73</sup>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水平和创新力逐步提升,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仍存在未能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中吸取优秀经验的问题,仍存在两者之间未能有机结合的问题。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

学实现相辅相成。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繁荣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引领作用。哲学社会科学是构建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发挥着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因此要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投入,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探究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实质问题,使得哲学社会科学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为基准,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层面的突破。另一方面,要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其合理成分,使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想理论的相互激荡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社会思潮

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要求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凝聚全社会的思想意识与社会力量,能够引领多元社会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sup>[10]106</sup>”由此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建设具有强大引领作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呈多元化态势,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同时存在,积极的与消极的并存,进步的与倒退的同在。例如,新自由主义作为近些年来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在经济上倡导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在政治上实施所谓“民主”。其中衍生出的各种负面社会思潮,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影响的人们的价值观,对意识形态甚至生活方式都造成了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主旋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日趋向好的态势,不断朝着建设强大引领作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前进。在当下新时代的浪潮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社会思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参 考 文 献]

- [1] 倪瑞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语境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09).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95.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3.
- [8]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329.

[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3.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闫卫平)

## The Internal Logic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Engels'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in the Letters of His Later Years

WU Yan-dong, LI Jie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In Engels' letters in his late years, he revealed the connotation of "Falsity"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clarified the secondary nature and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ideology,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 and ideolog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in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provide the increasing and innovative points for Marxist ideology theory. Engels'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in his late years embodi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controversy and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ummarizing Engels' basic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in his late years and exploring its internal logic are of grea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critical ability of socialist ideology, to build a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strong cohesion and leading force, an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Key words:** Engels;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basic viewpoints;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enlightenment